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¹

谢守红 吴社丽

(江南大学 商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文章选取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研究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都不高, 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稳步上升, 经历了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转变; 长江上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发展度差异明显, 下游地区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 下游地区处于初级协调状态, 中游和上游地区长江经济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 上海和贵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超前于新型城镇化水平, 其余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

【关键词】: 金融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度; 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 F299.27; F8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23) 02-0026-08

一、引言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必然发展的结果, 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长江经济带社会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 最近 10 年来,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在国家战略推动下,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也显著提升, 现已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龙头、以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支撑、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以沿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的空间格局。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加快投融资机制改革, 完善金融服务, 放开市场准入, 创新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 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 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同时,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金融业也面临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基于此, 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有学者从效率、公平、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1]; 也有学者基于金融功能论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包括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功能、金融稳健性五个维度的金融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2]; 还有学者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选取

¹ **【收稿日期】**: 2022-05-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专业市场型城镇转型发展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研究”(20BJY065)

【作者简介】: 谢守红(1966—), 男, 湖南邵阳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经济地理, 产业经济; 吴社丽(1998—), 女, 安徽铜陵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金融总体发展、金融支持创新发展、金融支持协调发展、金融支持绿色发展、金融支持开放发展、金融支持共享发展六个准则层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3]。

学术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角度众多。有学者聚焦于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农业现代化、绿色经济效率、金融生态建设、金融产业集聚等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协同关系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就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城乡高质量发展、城镇居民消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展开研究；还有学者就财政分权、产业升级、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等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展开研究。其中，就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而言，现有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作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为建设完善的城镇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城市交通系统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加快了城镇化进程^[4]；金融产业的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趋势迈进^[5]；金融相关比率的提升能够优化金融资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配置效率^[6]，通过释放积极的信号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重要支撑^[7]。就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协同关系研究而言，既有文献认为：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存在动态互动关系^[8]，金融资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的同时，城镇化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9]；金融部门具备的投融资功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劳动力供给等方面提供强大动力^[10]，激发其对城镇化进程中各项事业的投资热情^[11]，优化城市基本功能，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12]；金融产业集聚产生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能够降低投融资成本，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提升城镇化运营效率^[13]；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推动消费结构改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城镇化推进要求金融部门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为金融产业服务社会提供发展机遇，催化金融产业优化升级^[14]；金融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之间耦合协调值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两者相互促进作用明显^[15]，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空间分布呈板块化结构^[16]；金融生态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高度的耦合性，协调度逐步提升，且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异质性^[17]。

既往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相对于现有文献，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有：首先，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作为当前两大热点，研究成果颇多，但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很少，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本文基于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是相关领域研究的有益补充。

三、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分析

（一）金融高质量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1. 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人口城镇化

自《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以来，普惠金融事业迅速发展，为偏远、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撑，使越来越多农村居民在普惠金融的支持下实现脱贫摘帽、增收致富，逐渐向城市转移。可见，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够助力脱贫攻坚，实现金融精准扶贫，推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推进共同富裕。

2. 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城镇化

金融高质量发展对推动经济繁荣具有重要作用。服务于实体经济是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通过金融科技赋能传统企业，打造高技术产业链，实现企业各项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助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而通过金融手段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有利于推进经济城镇化。

3. 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城镇化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力量巨大。金融科技平台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让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也能享受金融服务，实现财富增值，因此，金融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精准配置，推

动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带动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4. 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城镇化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需要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作为保障，这充分依赖市场金融机构的融资力量。近年来，政府大力支持新基建发展，不断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而金融资本凭借其资金优势能够有效缓解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压力。由此可见，只有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才能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信贷支持，从而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城镇化发展。

5. 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环境城镇化

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和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发展为各项节能环保项目和绿色发展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撑。数字普惠金融事业蓬勃发展，通过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将更多资源集聚于绿色发展行业，提高绿色技术生产率；运用其绿色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有效推动绿色金融与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发展，提升生态环境城镇化水平。

（二）新型城镇化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1. 新型城镇化助力金融总体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推进社区建设、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建设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可见新型城镇化建设会产生巨大的金融需求；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需要根据小微企业需求、三农需求、贫困群体需求创新多样化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完善金融结构；新型城镇化重视公共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不仅需要政府支持，还需要完善投资、筹资体系，引入社会资本，提高金融效率；新型城镇化致力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重视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需要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降低金融风险。

2. 新型城镇化助力金融创新发展

新型城镇化本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带动消费群体的扩大，推动消费结构升级，释放消费潜力；同时必然会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住房建设等方面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为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创造新机遇，金融机构可以抓住机遇，发挥贷款优势，创新金融产品，推动金融创新发展。

3. 新型城镇化助力金融开放发展

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助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制造业的产品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开展国际贸易，引进外来投资，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带动资本市场发展，不断增强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4. 新型城镇化助力金融绿色发展

新型城镇化追求智能、集约、低碳和绿色，因此对金融体系有更高层次的要求。金融体系的构建需要兼顾新型城镇化基本要求，不断提升绿色金融供给能力，引导城镇化平稳健康发展，助力我国经济顺利转型。新型城镇化重视内在质量的提升，致力于实现生态型、低碳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这有利于为金融市场的绿色健康发展铺路，推动金融绿色发展。

5. 新型城镇化助力金融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能力和城乡一体化水平高低为核心标志，城乡协调发展的大环境能够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便利，带动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金融机构服务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提供保障，增加城镇化金融网点和金融人才供给，激发基层金融机构积极性，推动金融协调发展。

6. 新型城镇化助力金融共享发展

伴随新一代智能信息网络 5G、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信息化智能化的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应运而生，为打造智慧城市提供基础力量。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随着越来越多人流入城镇，充分享受数字经济时代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和金融科技力量带来的全方位智能体验，从而推动金融共享发展。

四、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一)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本着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参考李俊玲等关于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3]，选取金融总体发展、金融创新发展、金融开放发展、金融绿色发展、金融协调发展、金融共享发展六个维度共 13 项指标，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具体指标及权重见表 1 所列。

表 1 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权重(%)	方向
金融总体发展	金融规模	$(\text{金融机构存款} + \text{金融机构贷款}) / \text{GDP}$	5.02	正
	金融效率	$(\text{股票筹资额} + \text{债券筹资额}) / \text{金融机构贷款}$	6.04	正
	金融结构	$\text{金融机构贷款} / \text{金融机构存款}$	2.29	正
	金融风险	不良贷款率	2.18	负
金融创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3.91	正
金融开放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占比	$\text{外商直接投资} / \text{GDP}$	5.51	正
	外资银行资产占比	$\text{外资银行资产} / \text{银行资产总额}$	37.39	正
金融绿色发展	高耗能工业产业利息支出占比	$\text{高耗能工业产业利息支出} / \text{工业产业利息总支出}$	3.91	负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比	$\tex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 \text{GDP}$	5.22	正
金融协调发展	小型农村银行机构资产占比	$\text{小型农村银行机构资产} / \text{银行资产总额}$	2.61	正
	涉农贷款占比	$\text{涉农贷款} / \text{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2.80	正

金融共享发展	人均拥有贷款余额	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总人口	11.52	正
	每万人拥有银行机构数	银行金融机构数/总人口	11.60	正

2.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框架以及邓宗兵等、彭帮文等、宋祺俊和吕斌的研究[18, 19, 20]，本文选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五个维度共10项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过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具体指标及权重见表2所列。

表2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方向
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10.45	正
	就业结构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8.12	正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	人均GDP	14.96	正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8.04	正
社会城镇化	医疗保障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13.94	正
	教育水平	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	11.05	正
基础设施城镇化	公共交通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11.91	正
	道路设施	人均拥有城镇道路面积	8.70	正
生态环境城镇化	城市环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8.58	正
	城镇绿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25	正

（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1. 综合评价模型

各指标评价值通过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通过熵值法确定。

第一，标准化处理。由于评价指标原始数据量纲不同，在计算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影响，本文采用极值法进行标准化。

$$x_{ij} = \begin{cases} \frac{X_{ij} - X_{j \min}}{X_{j \max} - X_{j \min}}, & X_i \text{ 为正向指标;} \\ \frac{X_{j \max} - X_{ij}}{X_{j \max} - X_{j \min}}, & X_i \text{ 为负向指标。} \end{cases}$$

其中： $X_{j \max}$ 表示指标最大值； $X_{j \min}$ 表示指标最小值； X_{ij} 表示某地区第 i 年第 j 项指标原始值； x_{ij} 表示某地区第 i 年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由于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会出现 0 值，在计算中为消除 0 值的影响，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整体平移 0.000 1，以尽可能减少平移对原数据的影响。

第二，指标比重计算。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第三，信息熵计算。

$$e_j = k \sum_{i=1}^n p_{ij} \ln(p_{ij})$$

$$k = -\frac{1}{\ln(n)}; e_j \geq 0$$

其中： k 为调节系数，

第四，第 j 项指标的效用值计算。

$$f_j = 1 - e_j$$

第五，第 j 项指标的权重计算。

$$W_j = \frac{f_j}{\sum_{j=1}^m f_j}$$

第六，系统综合指数计算。

$$S_i = \sum_{j=1}^m W_j x_{ij} \quad (1)$$

其中：n 为评价地区；m 为评价指标；S_i 表示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W_j 表示系统内部各指标权重。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实现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程度。协调度指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反映协调状况的好坏。本文借鉴丛晓男的模型方法^[21]，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评价体系。耦合协调度模型共涉及 3 个指标值的计算，分别是耦合度 C 值、协调指数 T 值和耦合协调度 D 值。结合耦合协调度 D 值和协调等级划分标准，最终得出各项的耦合协调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C_i = 2 \sqrt{\frac{U_1 U_2}{(U_1 + U_2)(U_1 + U_2)}} \quad (2)$$

$$D_i = \sqrt{C_i T_i} \quad (3)$$

$$T_i = a_1 S_1 + a_2 S_2 \quad (4)$$

其中：C_i 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 1]；D_i 为耦合协调度，T_i 为协调度；a₁、a₂ 为权重系数，且 a₁+a₂=1；S₁ 表示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S₂ 表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计算两者系统耦合协调度时，考虑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同等重要，将 a₁ 和 a₂ 均赋值为 0.5，并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等级，具体见表 3 所列。

表 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0, 0.1]	1	极度失调
[0.1, 0.2]	2	严重失调
(0.2, 0.3)	3	中度失调
[0.3, 0.4]	4	轻度失调
[0.4, 0.5]	5	濒临失调
[0.5, 0.6]	6	勉强协调
[0.6, 0.7]	7	初级协调
[0.7, 0.8]	8	中级协调
[0.8, 0.9]	9	良好协调
[0.9, 1.0]	10	优质协调

3. 相对发展模型

为了研究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情况，确定两者相对发展类型，参考刘浩等的研究方法[22]，本文引入相对发展模型，公式如下：

$$k = \frac{S_1}{S_2} \quad (5)$$

其中：k 表示相对发展度；S1 表示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S2 表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度类型划分见表 4 所列。

表 4 相对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

范围	相对发展程度
----	--------

[0, 0.9]	金融高质量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
(0.9, 1.1)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同步
(1.1, x)	金融高质量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

五、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一）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分析

本文采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2—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2019 年各省市《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以及中国经济信息网。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相关结果见表 5 所列。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为 0.256，2011—2019 年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由 0.221 增至 0.279，增长幅度为 0.058，说明金融高质量发展处在缓慢推进中。就各子系统指数而言，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由 0.046 增至 0.057，说明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整体金融规模在不断扩大，金融效率明显提高，金融结构趋于完善，金融风险逐渐降低；金融创新发展水平由 0.003 增至 0.032，说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共享，变更金融体制，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发展水平提升明显；金融开放发展水平由 0.069 降至 0.051，可能是因为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金融竞争力不够，金融开放水平不足，区域间互联互通水平有待提高，金融走向世界的能力有待加强；金融绿色发展水平由 0.039 增至 0.043，源于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支持资源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不断加大对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项目的投资，促进绿色金融发展；金融协调发展水平由 0.029 增至 0.032，说明金融所具有的杠杆作用能够合理分配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促进金融协调发展；金融共享发展水平由 0.035 增至 0.065，表明金融业日新月异的变革实现了共享金融发展路径的多样化，金融共享体系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尤其互联网金融时代所演变出的新共享体系进一步实现人人共享。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值为 0.402，新型城镇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综合指数由 2011 年的 0.287 增至 2019 年的 0.516，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增长幅度为 0.229。由于近 10 年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明显。其中，人口城镇化水平由 0.054 增至 0.089，新型城镇化将“以人为本”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推进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经济城镇化水平由 0.043 增至 0.106，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市场内需得到释放，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城镇化水平由 0.071 增至 0.137，城镇化涵盖医疗、教育、就业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持续动力；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由 0.067 增至 0.106，说明随着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走向均等化，金融交通管理系统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功能明显提升；生态环境城镇化水平由 0.052 增至 0.077，说明伴随着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发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相继出现，推动绿色城市建设。

表 5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及子系统指数

系统/子系统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均值	变化
金融高质量发展	0.221	0.236	0.251	0.260	0.259	0.263	0.258	0.276	0.279	0.256	0.058

金融总体发展	0.046	0.049	0.048	0.053	0.054	0.058	0.047	0.058	0.057	0.052	0.011
金融创新发展	0.003	0.009	0.014	0.017	0.021	0.022	0.026	0.029	0.032	0.019	0.029
金融开放发展	0.069	0.070	0.072	0.069	0.062	0.058	0.060	0.057	0.051	0.063	0.018
金融绿色发展	0.039	0.040	0.043	0.042	0.041	0.040	0.036	0.040	0.043	0.040	0.004
金融协调发展	0.029	0.030	0.032	0.033	0.033	0.033	0.033	0.032	0.032	0.032	0.003
金融共享发展	0.035	0.037	0.041	0.046	0.049	0.052	0.056	0.060	0.065	0.049	0.030
新型城镇化	0.287	0.313	0.347	0.375	0.401	0.434	0.468	0.480	0.516	0.402	0.229
人口城镇化	0.054	0.058	0.062	0.066	0.070	0.075	0.080	0.084	0.089	0.071	0.035
经济城镇化	0.043	0.048	0.056	0.062	0.070	0.080	0.090	0.100	0.106	0.073	0.063
社会城镇化	0.071	0.079	0.087	0.094	0.102	0.109	0.116	0.124	0.137	0.102	0.066
基础设施城镇化	0.067	0.071	0.083	0.092	0.095	0.102	0.112	0.098	0.106	0.092	0.039
生态环境城镇化	0.052	0.056	0.059	0.061	0.063	0.068	0.070	0.073	0.077	0.064	0.025

（二）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析

表6、表7报告了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各省市、各年份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长江经济带总体均值计算结果显示，协调等级为6，耦合协调阶段为勉强协调阶段。

从变化过程来看，耦合协调度经历了2011—2012年的濒临失调阶段到2013—2017年的勉强协调阶段再到2018—2019年的初级协调阶段。可见，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不断磨合，其总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稳步上升。

从各区域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中游地区协调等级为5，耦合协调程度为濒临失调，下游地区协调等级为7，耦合协调阶段为初级协调。可见，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经历了从2011

年的中度失调到2012—2016年的轻度失调再到2017—2019年的濒临失调；中游地区经历了从2011年的中度失调到2012—2015年的轻度失调再到2016—2019年的濒临失调；下游地区经历了从2011—2015年的勉强协调到2016—2019年的初级协调。可见，下游地区的发展进程超前于上游和中游地区，下游的省市基于上海这一金融中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了金融高质量超前发展。

从各省市来看，2011—2019年各省市耦合协调程度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处于第一梯度的省市是上海，经历了中级协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耦合协调程度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处于第二梯度的省市有江苏、浙江、重庆，江苏和浙江，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再到中级协调的转变，重庆一直保持勉强协调状态；处于第三梯度的省市有安徽、江西、四川，经历了由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转变；处于第四梯度的省市有湖北，经历了由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再到勉强协调的转变；处于第五梯度的省市有湖南、贵州、云南，其中，湖南经历了从中度失调到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再到勉强协调的转变，贵州经历了由中度失调到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转变，云南经历了由中度失调到轻度失调再到濒临失调的转变。

表6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阶段

区域/省市	耦合度 C 值	协调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度 D 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阶段
长江经济带总体	0.864	0.374	0.558	6	勉强协调
长江经济带上游	0.857	0.276	0.481	5	濒临失调
长江经济带中游	0.797	0.295	0.482	5	濒临失调
长江经济带下游	0.920	0.530	0.691	7	初级协调
上海市	0.961	0.730	0.837	9	良好协调
江苏省	0.853	0.545	0.680	7	初级协调
浙江省	0.935	0.490	0.675	7	初级协调
安徽省	0.932	0.355	0.572	6	勉强协调
江西省	0.927	0.287	0.513	6	勉强协调
湖北省	0.729	0.306	0.472	5	濒临失调
湖南省	0.736	0.292	0.460	5	濒临失调
重庆市	0.922	0.319	0.541	6	勉强协调
四川省	0.832	0.343	0.531	6	勉强协调
贵州省	0.903	0.245	0.467	5	濒临失调
云南省	0.772	0.197	0.385	5	轻度失调

表7 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区域/省市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长江经济带总体	0.436	0.488	0.532	0.554	0.571	0.584	0.592	0.620	0.640
长江经济带上游	0.352	0.406	0.469	0.494	0.500	0.488	0.505	0.550	0.568
长江经济带中游	0.327	0.405	0.436	0.457	0.496	0.523	0.535	0.559	0.597
长江经济带下游	0.603	0.633	0.667	0.687	0.698	0.727	0.723	0.737	0.745
上海市	0.787	0.807	0.828	0.839	0.828	0.846	0.877	0.863	0.858
江苏省	0.598	0.631	0.655	0.669	0.690	0.707	0.695	0.732	0.740
浙江省	0.589	0.620	0.643	0.670	0.671	0.707	0.704	0.728	0.744
安徽省	0.438	0.473	0.540	0.568	0.601	0.648	0.615	0.624	0.637
江西省	0.417	0.464	0.460	0.477	0.520	0.539	0.556	0.577	0.611
湖北省	0.332	0.392	0.437	0.453	0.446	0.519	0.533	0.547	0.586
湖南省	0.233	0.358	0.412	0.442	0.523	0.511	0.517	0.553	0.593
重庆市	0.521	0.505	0.543	0.551	0.541	0.516	0.534	0.566	0.596
四川省	0.435	0.487	0.517	0.536	0.534	0.523	0.549	0.610	0.590
贵州省	0.208	0.326	0.424	0.479	0.508	0.537	0.543	0.574	0.607
云南省	0.243	0.304	0.393	0.411	0.417	0.376	0.392	0.450	0.480

（三）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分析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类型见表8所列，其中，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前者（S1），新型城镇化为后者（S2）。总体来看，相对发展类型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从各区域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均滞后于新型城镇化；从各省份来看，除上海和贵州金融高质量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其他省份均滞后。就上海而言，其金融业一直处于长江经济带领先地位，近年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金融高质量发展领先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毋庸置疑；就贵州而言，近年来在国家金融政策的指引下，金融活力持续增强，金融业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促使金融高质量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建设。

表8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类型

区域/省市	S1	S2	K	相对发展类型

长江经济带总体	0.256	0.402	0.637	S1 滞后于 S2
长江经济带上游	0.211	0.319	0.661	S1 滞后于 S2
长江经济带中游	0.188	0.378	0.497	S1 滞后于 S2
长江经济带下游	0.352	0.503	0.700	S1 滞后于 S2
上海市	0.619	0.434	1.426	S1 超前于 S2
江苏省	0.258	0.654	0.394	S1 滞后于 S2
浙江省	0.288	0.531	0.542	S1 滞后于 S2
安徽省	0.242	0.393	0.616	S1 滞后于 S2
江西省	0.216	0.329	0.657	S1 滞后于 S2
湖北省	0.174	0.414	0.420	S1 滞后于 S2
湖南省	0.175	0.392	0.446	S1 滞后于 S2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进行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研究表明：首先，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都处于逐年上升的状态，但是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其次，长江经济带总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经历了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转变，但是上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发展差异明显，下游处于初级协调，中游和上游处于濒临失调，下游协调发展水平明显超前于中游和上游；最后，上海和贵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超前于新型城镇化水平，其余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坚持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大对重点项目的金融支持，开发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发挥金融机构在城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将新型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各金融部门，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其次，根据城镇化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投融资方式，实现信贷投放倾斜于城镇化，为城镇化和建设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再次，加快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要作用，为完善金融市场提供更多市场动力；最后，坚持科技创新，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健全科技成果激励机制，加强数字经济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高一铭, 徐映梅, 季传凤, 等. 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布特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10):63-82.

[2] 徐璋勇. 金融发展质量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5):545-551.

-
- [3] 李俊玲, 戴朝忠, 吕斌, 等. 新时代背景下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评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19(1):15-30.
- [4] WELLMAN K, PRETORIUS F.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ductivity, Project Evaluation and Finance[J]. Wiley Blackwell, 2012, 8(22):53-82.
- [5] SZIRMAI A. Industrialization as an Engine of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50—2005[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2(4):406-420.
- [6] 柏宏繁, 李中坚, 徐廷全, 等. 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甘肃省例证[J]. 征信, 2020, 38(4):82-88.
- [7] 刘士义.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金融支持路径[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7):63-67.
- [8] BUCKLEY M, HANIEH A. Diversification by Urbanization: Tracing the Property-Finance Nexus in Dubai and the Gulf[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14, 38(1):155-175.
- [9] 胡朝举.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 作用机理、模式工具与优化路径[J]. 甘肃社会科学, 2017(4):249-255.
- [10] CHO S H, WU J J, BOGGESS W G. Measuring Interactions Among Urbanization, Land Use Regulations, and Public Fina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3, 85(4):988-999.
- [11] CHEN C. Public Infrastructure Finance: Symposium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8(2):126-134.
- [12] 周恩静. 新型城镇化对金融支持的需求、难点和路径分析[J]. 西南金融, 2013(10):53-55.
- [13] 赵永平, 王义龙. 金融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耦合协调分析——以空间优化为视角[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8(6):45-54.
- [14] 中国人民银行荆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邵光清, 谢云.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动态互动关系——基于面板VEC模型分析[J]. 武汉金融, 2013(10):31-33.
- [15] 谢赤, 毛宁. 金融生态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关系[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3):92-96.
- [16] 赵永平, 王义龙. 金融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耦合协调分析——以空间优化为视角[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8(6):45-54.
- [17] 俞思静, 徐维祥. 金融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时空分异研究——以江浙沪为例[J]. 华东经济管理, 2016, 30(2):27-33.
- [18] 邓宗兵, 宗树伟, 苏聪文, 等.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10):78-86.

[19] 彭邦文, 武友德, 曹洪华, 等. 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2):103-114.

[20] 宋祺佼, 吕斌. 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2):20-27.

[21] 丛晓男. 耦合度模型的形式、性质及在地理学中的若干误用[J]. 经济地理, 2019, 39(4):18-25.

[22] 刘浩, 张毅, 郑文升.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环渤海地区城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10):1805-1817.